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哲学思考

周树智

(西北大学, 陕西 西安 710069)

摘要: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四次会议审议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为我国今后五年经济和社会发展指出了比较明确的方向和道路。落实、贯彻和实现《规划纲要》提出的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这一新的总方针,有必要从哲学世界观的高度思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全面系统深入地理解和掌握这一新的总方针的精神实质,坚持以民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总体布局,坚持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同步进行,以科学发展观的发展哲学指导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关键词:“十二五”规划纲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哲学思考

中图分类号: B 02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7192(2011)03-0001-06

A Philosophical Thinking on the Mod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ZHOU Shu-zhi

(The Philosophy Institute of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Xi'an 710069, China)

Abstract: Having been approved at the 4th session of the 11th NPC, “Twelfth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Five-Year Pla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oints to the direction and path for our country’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next five years. In order to implement the general policy newly proposed by the Plan to transform the mod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is necessary to think of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height of philosophical worldview, and know well the essence of the general policy in depth. The paper holds the opinion of taking the livelihood of the people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the foothold consistently, adhering to the general layout of the mod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sisting on the parallel reform in both economy and politics, and carrying out the transform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concept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Key words: *Twelfth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Five-Year Plan; the mod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philosophical thinking*

收稿日期: 2011-04-27

作者简介: 周树智(1942-),男,陕西西安人,西北大学哲学与政治学教授,西北大学哲学研究所名誉所长,西北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陕西省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会会长,陕西省价值哲学学会会长,研究方向为哲学、政治学。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四次会议 2011 年 3 月 14 日审议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为我国今后五年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指出了比较明确的方向和道路。落实、贯彻和实现《规划纲要》提出的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这一新的总方针,有必要从哲学世界观的高度思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所谓哲学思考,就是要以世界观的视野从总体和整体上审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全面系统深入地理解和掌握这一新的总方针的精神实质,就是要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置于经济和社会整体发展的框架内去思考,坚持以民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总体布局,坚持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同步进行,以科学发展观的发展哲学指导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一、坚持以民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纲要》指出:“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1]这一规定指明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价值取向。我们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直接目的,无疑是为了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这是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当然,我们不是为发展经济而发展经济,发展经济的深层目的,无疑是为了民生,为了保障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正是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发展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就是说,只有保障和改善民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发展经济才有根本的价值,也才能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参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否则,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发展经济就会失去应有的意义。历史上有过这样的经验教训:前苏联在斯大林时期也很重视经济发展,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国民生产总值在二战前达到世界第二位。可是,由于轻视和放松了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人民的日常物质生活资料短缺,大多数人生活处于贫穷状态,从而积起民怨,成为前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个教训我们一定要记取,一定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发展经济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保障和改善民生,既涉及到经济本身发展,也涉及到国民收入的分配问题。“十一五”期间,我国 GDP 总量积累连续超车,2005 年一路甩开意大利、法国和英国,跃升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2007 年又超过德国,世界排名第三,2010 年第二季度又超过稳坐全球 GDP 总量第二位 42 年的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可是,我国内部的贫富差别也呈现出持续扩大的趋势。从 1992 年开始全国总体基尼系数已达到国际公认的警戒线 0.4,2004 年达到 0.44,2010 年初已达到 0.47,之后还在不断扩大。当今中国占全国人口 20% 的富人掌握着全国 80% 的财富,而占全国人口 80% 的民众只掌握全国 20% 的财富;行业收入差距很大,老板与员工收入差距更大,领导与下属的收入差距大得惊人。贫富差距扩大这个问题如果在“十二五”期间还不能有效缩小,其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就是说,当社会失去了收入分配上的公平正义,不仅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发展经济将没有意义,而且会直接危及到国家政权的稳定和巩固。因此,“十二五”期间必须优先考虑缩小贫富差距。要有效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政府必须通过公共政策干预初次收入分配,确保劳动者应得到的最基本的劳动报酬。其次,国家在税收政策上应对富人实行高额累进税制,逐级加大级差税收,让富人更多的回报社会。特别是要坚决打击官商勾结生成的权贵资本对广大民众的盘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再次,必须通过政府二次分配调节全社会收入水平,包括调节行业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并且定期提高居民工资收入,使居民收入的增长幅度适应当地 GDP、CPI 变化。最后,大力发展慈善事业,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使民有所居,少有所学,壮有所为,老有所养,失业者和残疾人有救济等。总之,只有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发展经济才会有持久动力,也才是真正有价值的。

二、坚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总体布局

《纲要》指出:“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1]。这是《纲要》为“十二五”期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规定的核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有明确的战略规划和总体布局,主攻方向明确,才能凝聚人心,团结全国上下,齐心协力,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奋斗。当然,要具体落实这一方针,有几个重大的战略问题还必须加以明确。

第一个问题,扩大内需与对外开放的战略结构调整转型问题,这是发展经济的直接动力。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市场的大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离不开与外国的经济合作。“十一五”期间,我国强调大量引进外资,加大对外开放和出口贸易,拉动了我国经济发展。“十二五”期间无疑应坚持吸引外资和对外开放的战略方针,以实现互利共赢。但是,我们又必须看到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大大削弱了国外的购买力和投资力度,国际市场疲软的态势一时还不可能阻止,还会持续一个时期。因此,必须调整投资、出口和消费的战略结构关系。《纲要》规定“要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局面”^[1]。把“国内消费”排列到了第一位,为扩大内需,拉动和发展经济指出了明确方向。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里指出:“消费直接也是生产,正如在自然界中元素和化学物质的消费是植物的生产一样。例如,在吃喝这一种消费形式中,人生产自己的身体,这是明显的事。而对于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从某一方面来生产人的其他任何消费方式都可以这样说。消费的生产”^{[2]8}。我们应看到我们中国不仅土地辽阔,而且人口众多,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居民的消费潜力还十分巨大,若能扩大内需,必定会大大加快我国的经济发展。

第二个问题,农业和工业的结构调整转型问题,这是发展经济的基础动力。我们中国曾是一个长期落后的农业国,中国要走向现代化,必须由农业国走向工业化,发展工业经济。因此,建国后多年来都是农业支持工业。现在我国的工业已经有了相当规模,农村城镇化速度在加快,农民进城务工也在逐年成倍增长。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看到,现在农民工地位低下、农村被冷落、农业土地荒芜的现象日益突出,城乡差距日

益拉大,我国农业与工业的结构比例已经出现严重失调。解决问题的出路,必须是实行城乡统筹,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以工促农,支持“三农”发展,实现农业现代化。

第三个问题,是第二产业工业和第三产业信息业和服务业的结构调整转型问题,这是发展经济的决定性动力。当今世界一些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了“后现代化”时代,其主要特点就是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日益成为主导产业,这个第三产业主要依靠的就是高科技信息技术和知识创新。因此,在我国的经济结构中也必须不断加大和提高第三产业的比例。《纲要》规定“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1]。这个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只有坚持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建设学习型创新型国家,培育优秀人才,才能从根本上提高我国在世界上的经济竞争力,我国的经济才会出现突飞猛进的发展。不过,这里存在一个如何看待文化事业的问题,这是一个值得冷静思考的问题。在有些人看来,“十一五”期间,文化事业发展势头很猛,2004年以来,全国文化事业产值年均增长速度22%,比同期GDP增速高3.6个百分点。因此,应当把文化产品与其它商业产品一样对待,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我认为,这种看法欠妥,应对文化事业加以分类辨析。因为文化事业从性质上看,它是人们精神领域的生活,是精神性质产品,像科学研究、文化教育、图书档案、文物博览、全民体育、医疗卫生、公众娱乐、休闲公园等,都是是非盈利性质的,公益性的公共物品,是公共福利事业,对这一类事业文化,政府理应为它买单。“十一五”期间不少地区和单位把它们和盈利性质的商品一样看待,拿到市场上买卖,虽然赚了不少钱,但却使它们丧失最起码的公共道德底线,不仅不利于文化事业的真正发展,而且给人们的精神生活造成了深远的负面影响。因此,不应当把这一类文化事业当作商业产品来对待,而应当把这一类文化事业真正当作事业文化认真去做,更有利于这一类文化事业自身的发展,也会为经济结构转型和经济发展提供持久的动力。当然,对

另一类具有少数人观赏、享乐、消费性质的文艺演出、竞技体育等文化产品,它们具有私人物品性质的特点,它们和商品一样,当然,应该把它们作为文化产业或产业文化认真去做,既可满足一些人的需求,又可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第四个问题,形成合理的区域经济发展和功能区域经济发展的结构问题,这是发展经济的综合动力。我国地域广大,各地区域经济发展很不平衡。长期以来,我国东部沿海经济发展比较快,其他地区经济发展比较慢。这种区域经济不平衡格局严重影响我国经济整体平衡发展。改革开放后,我国在鼓励东部率先发展的同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经济崛起,情况有了很大变化。因此,“十二五”期间应当进一步坚决执行和落实这一战略方针,绝对不能动摇。同时,应当强化功能性区域经济发展优势,不仅要保持珠三角、长江三角的先进态势,而且应开辟大关中(关中——天水)经济区、西三角(西安、成都、重庆)经济区、陕甘宁经济区的新功能经济区域,更有利于加快经济发展。

第五个问题,第二产业工业与环境保护产业的结构关系调整问题。西方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路子是以自然资源开发为代价的。现在我国的经济也存在这个问题,不少地方发展工业,只是简单开采自然资源,不知节约自然资源,只知发展工业,不顾环境污染,不仅严重破坏环境,而且严重威胁到工人的生命和居民的安全。《纲要》规定“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1]。我认为,这个提法很好。的确,我们在发展经济过程中,只有节约自然资源,建设循环型经济,保护生态平衡,保护自然环境,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我们的经济才有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三、坚持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同步进行

《纲要》指出:“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1]。改革开放是我们新时代的标志和旗帜,我们必须明白改革开放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发展经济的基方本针,《纲要》这一规定完全正确。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发展经济的本身虽然是个经济问题,但是经济与政治是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一方面经济发展是政治上层建筑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政治体制和政治领导又是保障经济发展的关键条件。我国的现代史表明: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中国首先实现了政治制度转型,由国民党的独裁专制政治制度转变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和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正是有了这个政治前提,我们仅用了三年就实现了国民经济恢复;又用了三年时间,就实现了“三大改造”,消灭了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几千年的私有制,建立起社会主义公有制,然后才有生产力和经济大发展。进入改革开放新时代,也是因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战略决策,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才有后来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大发展,才会有今天的经济大繁荣。

现在我们在经济领域面临的新任务,就是只有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才能保证经济又快又好的持续发展。然而,阻碍这一转型的重要的政治因素,就是我们的政治体制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在高度集权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下,党政机关对市场经济干预过度,甚至可以说,无所不管;同时,我们不少党政机关有不少人蜕化变质,以权谋私,贪污受贿,腐化堕落,官商勾结,新权贵资本盘剥广大民众,引起民众不满。这些问题若不从根本上解决,不仅会阻碍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即使经济转型了,经济发展了,也会使社会失去公平正义,造成政治危机,甚至会使党和国家改变颜色。伊朗就有这样的教训:伊朗国王巴列维于1963年开始了雄心勃勃的“白色革命”,企图通过发展石油使伊朗成为世界经济强国。15年后,伊朗经济确实大发展了,但是,由于他拒绝政治改革,拒绝民主宪政,政治腐败,激起民怨,结果被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什叶派于1978年推翻。邓小平生前讲得好:“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

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现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3]164}。因此,我们一定要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加快政治体制改革。三十年来我们在政治改革上取得了不少的战绩,全国人大在立法方面取得很大成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面成绩也不小,中国共产党在反对腐败和党风廉政建设方面成绩斐然。但是,这只是局部的部分的政治体制改革,还不是从总体上整体上全面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2004年9月15日,胡锦涛主席《在首都各界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要依宪执政。”为我国全面深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树立宪政社会主义新理念,首要的原因是由宪法和宪政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决定的。毛泽东指出:“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4]129}。又说:“讲到宪法,资产阶级是先行的,英国也好,法国也好,美国也好,资产阶级都有过革命时期,宪法就是他们在那个时期搞起的。我们对资产阶级民主不能一笔抹杀,说他们的宪法在历史上没有地位”^{[4]127}。这就是说,宪法在一个国家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它是国家的总章程,是根本大法,也叫母法,其他基本法和具体法律都是按照宪法原则派生的,从而形成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宪政,即宪法政治或立宪政治,它是指一个国家由宪法和法律体系规范和强制保障实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社会制度等制度体系,从而使人们的社会政治生活能够保持正常的秩序和良性运行。资产阶级建国前后制定宪法,实行宪政,首先是为了限制君主的权力,保障公民权利,以法治国,这是宪政的民主本质。因此,“宪政”在政治学界被称之为“限政”。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因为宪法立国,宪政治国,才成为当今经济社会发达的先进国家。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治国

方法后,才在自己的国家搞起宪法的。但是,由于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在经济落后的封建专制主义基础尚未完全铲除的历史条件下建立起来的。因此,即使制定了宪法,却未真正实现宪政。苏联是这样,我们中国也一样。众所周知,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是1954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但是,宪法制定好之后,却被束之高阁起来了。包括领导主持起草宪法的毛泽东,也对宪法持这样的态度。毛泽东1958年8月24日在北戴河会议上讲话说:“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能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我们每次的决议都是法,开一个会也是一个法。”“要人治,不要法治。《人民日报》一个社论,全国执行,何必要什么法律?”^{[5]426-427}不仅是毛泽东,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是这样对待宪法和法律的。例如,刘少奇说:“到底是人治还是法治?看来实际上靠人,法律只能做办事参考。党的决议就是法”^{[6]2}。由于我国有宪法无宪政,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为依然是前现代的传统封建社会的人治,这是导致毛泽东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及今天高度集权的管理、党政干部政治腐败泛滥的总根源。所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首先就应树立宪政社会主义的新理念,树立宪法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实施宪政,克服人治,依宪治政,依宪治国,中国才能真正进入全面深入地政治体制改革。

宪政社会主义与宪政资本主义是对立的。众所周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政是以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为根本理念的。作为一种制度体系,其实质是用宪政制度体系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维护资本家的私有制及其对工人的雇佣劳动和剥削压迫。这种宪政自由主义形式上似乎是讲全民自由民主的,其实质是有条件的自由民主、金钱式的自由民主、富人的自由民主、资本家的自由民主,而劳苦大众的自由民主是被许多条件限制的。因此,我称这种民主本质上为“有限民主”。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应当超越这种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超越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和宪政资本主义,目的是为了树立宪政(下转第10页)

好实施效果,是当今世界成功应对固体废弃物污染的一项有效经济手段。因此,应在固体废弃物管理方面大力实施环境押金制度。而我国不仅没有环境押金制度的立法,还在环境法理论研究中对其涉及较少,但是我国所面临的日益严重的

固体废弃物污染问题和相关法律法规的无效却表明环境押金制度对我国的重要意义,这也要求我国必须构建环境押金制度,在固体废弃物管理方面妥善的实施该制度,从而完善我国的环境法律体系和环境法制建设。

参 考 文 献

- [1]张世秋,李彬译. 环境管理中的经济手段[M]. 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6.
- [2]刘长兴,方弟州. 环境押金制度的构建[J]. 城市环境,2002,16(2):27-28.
- [3]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发展中国家环境管理的经济手段[M]. 刘自敏,李丹,译. 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6.
- [4]左铁镛,冯之浚. 中国循环经济论[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 [5]王金南. 押金制度在固体废物污染控制中的应用[J]. 环境科学研究,1992,5(6):54-56.
- [6]王建明. 城市固体废物管制政策的理论与实证研究[M]. 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
- [7]朱仁友. 押金制度:一些国家解决固体废物污染问题的经济手段[J]. 价格月刊,1999(2):38.

(上接第5页)社会主义。就是说,我们要用宪政保护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

宪政社会主义是一种政治制度体系。如果从宪政社会主义的高度思考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笔者认为,主要应从宪政制度构建上解决好三种政治力量的整合工作,即作为领导者的共产党、负责公共管理的人民政府和参与选举和监督党和政府行为的人民群众三者关系应宪政化、法制化、规范化、程序化,就是说,应在宪法和法律规范下建设公民有序民主的制度体系,包括建设

中国共产党自内而外的有序民主的密切联系群众的领导制度体系,建设人民政府自上而下的有序民主的管理公共事务的责任制度体系,建设人民群众自下而上的有序民主的选举和监督党和政府的政治参与制度体系。只有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同步进行,建立完善的宪政社会主义的制度体系,才能使我们社会形成民主、有序、和谐、稳定的政治局面,才能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强有力的政治支持,才能保障顺利健康的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发展。

参 考 文 献

- [1]国务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N]. 人民日报,2011-03-17(4).
- [2]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3]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4]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 [5]张慙. 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的来龙去脉及其严重影响[M]//孙琬钟,李玉臻. 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文集:第四辑,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
- [6]于一夫. “以党治国”面面观[J]. 炎黄春秋,2010(7):1-6.